

中西方中医界、人类学界的一次跨文化对话

贺 霆

云南中医学院中医西传研究所于今年6月底承办了一次国际论坛，名称是“中医西传暨人类学西方社会研究”，与会代表34人，其中国外代表15人（法国11人，美国3人，意大利及加拿大各1人），国内代表19人，两天共有演讲21场、圆桌会议1次。

从策划伊始，本所同仁就努力将论坛作为中西方中医界及人类学界一次建设性对话的机会。此次论坛名为“中医西传”，其实关注的是中医经西传以后，受当地居民根据自己的文化资源解读、重组、再创造后的形态，以及此过程的原因及意义，所以论坛话题其实是“西方中医”，关心的是西方社会与文化。

这样的选择当然会面临挑战甚至风险，因为第一，中医话题本身在国内的讨论就很难把握，支持、反对双方出言不逊，论坛容易变成战场；第二，“西方中医”则更容易引起争议，而且夹杂意识形态、国家主义以及各方经济利益，很难做到诚实、中肯；第三，“西方中医”一词政治上也十分“不正确”：在“韩医”、“汉方”夹击形势下，中国内地官员们觉得中医被“去中国化”已经险象环生，再也容不得“西

方”、“南方”、“北方”来挑战“中央帝国”^[1]；第四，边陲风气谨慎，政治嗅觉对“文化”讨论尤其灵敏，论坛容易越雷池、犯纪律^[2]；第五，这样的“跨文化”话题远远超出医学临床研究，对一所地处边远的二流中医学院在知识结构上不啻是挑战。当然，将人类学作为对话方法并怂恿进行西方社会研究，更为论坛平添变数。所幸主政者宽容，对论坛理念未加干涉，只是责令将论坛手册中“西方中医”字眼以“中医西传”代之，发言讨论则不受此限，也算是“无禁区”一例。由此，我们得以放弃平稳中庸，游走于剑锋刀刃之间，论坛达到既定目标并有所突破，故称“有惊无险”。下面就以本论坛取得的一些成绩，请同道玩味。

一、“西方中医”的渊源与形态

论坛的对话即以向中国听众介绍“法国/西方中医”的三个源头开始，他们分别是：前法国外交官苏里耶德莫郎、越南籍医生阮文仪、香港中医师梁觉玄。他们学习、传播针灸/中医的经历表明，至少是从上世纪30年代西方中医开始具备临床形态的头40年中，其与中国内地中医，特别是“学院派”中医无甚关联；同时，该“三巨头”的弟子均为西方居民，对中医在西方的传播起主要作用；这给“西方中医”形成自己的形态提供了条件。

那么，经过西方文化解读、重组、再创造后的“西方中医”的形态究竟如何？最有代表性的恐怕要属法国针灸协会会长 Andres 医生在论坛上讲述的“基于经络的诊断方法”。这种技艺已经在法国及西方使用、传授了35年，中国中医界对其理论应该不会陌生，因为源自经典的《针灸甲乙经》及《灵枢》；但西方人对此的解读以及临床应用，

[1] 去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广立重点学科，笔者牵头申报“西方中医学”，审核时被批“去中国化”、改称“中医西传学”，获通过。

[2] 笔者在滇被告知：高校内举办“文化”沙龙，须报省委宣传部批准；“学术”沙龙则无碍。

则会令后者大吃一惊。据 Andres 医生讲，这种技法其灵感来自《针灸甲乙经》对穴位的描述，“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即治疗的切入点因涉及的是患者的天、人还是地的层面而不同。如果涉及患者的本体和身份（天），只能取一个穴位。如果涉及患者的气（人），则只能取少数穴位，以协调气的通行（例如结合外经的交汇穴进行治疗时）。如果涉及人体部位或者地理层面（地），就可以取多处穴位，包括一些局部穴位，以疏通某个气血运行特别不畅的区域。”而《灵枢》第 72 章《通天》所描述的“五人”即太阴、少阴、太阳、少阳和阴阳和平之人，也是对应该天、地、人三才；同书第 34 章《阴阳 35 人》则把人的分型与“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及相应的经络联系起来，从而具备了可操作性：“首先确定患者身上气的类型和属性（木、火、土、金、水），然后按照患者的症状和某个器官容易患的病症，在有关经脉上选择一个合适的穴位。例如，如果患者的气质类型为太阳，属性为火，那就根据穴位的名称和患者的病症选择手太阳小肠经（属火）上的一个穴位”。^[3]人类学实地田野工作观察到，这种技法致力于通过似乎无休止、无边际的询问，结合脉、舌象以及手的形状（“关节粗大、掌纹众多属木；双手纤长，手指呈火苗状属火；双手丰满并呈正方形属土；双手呈矩形且轮廓鲜明则属金；双手浮肿、按下有凹痕属水”）来判定患者的气质属性，以便“一穴定乾坤”。

不必具备中医专业知识，也能觉察到这种西方人发明的针灸方法有以下几个特点：

- 力图遵循传统中医或传统中国文化的描述及逻辑传统；
- 思辨先于经验、重于经验；
- 重视象征意义（穴名、手形）；

[3] Gilles Andres, *Le diagnostic selon les méridiens*，“基于经络的诊断方法”，中医西传国际论坛发言稿，翻译：云南大学法语系研究生杨柳。

——形态（包括理论与操作）与当地文化习惯及主流价值观反差大。

论坛上所介绍的西方中医，大多符合上述特点，如“筑宾”一穴在产科针灸中的神奇功效，“阴升阳降”理论应用于转胎，以及“五行针灸”、“耳医”等。

这类中国听众从未所闻的“西方中医”，在论坛内外引起很大震撼，也首次挑战了国内流行的“去中国化”论。这种观点认为当中医传向与内地文化差异大的地区（如西方社会）时，其文化内涵会被去除，只剩有功效的医疗操作层面的皮毛。^[4]本次论坛所介绍的多个例证说明，“西方中医”最关心的恰恰是传统中医的文化内涵，“去中国化”论是个伪命题，至少在西方社会是这样。这是论坛通过中西对话后取得的成绩之一。

二、西方中医：潜在的（反向）文化冲突

在西方的中医当然具有多种形态，本论坛为配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立重点学科“中医西传学”（原为“西方中医学”）而召开，故集中讨论一种特殊的“西方中医”。我们对其定义为：西方人根据当地环境、以自身文化对中医传统解读、重组、再创造而形成的“中医”。称“中医”，一是因为西方居民主观上认同其来源于中国，二是因为客观上其摹本为中医经典，同时其每一流派的始祖多少亲历中医诊疗过程。称“西方”，是因为长期中西方隔绝、西方强势文化及汉学传统，舶来品中医在当地被改造，其形态已不同于中国本土的中医。至于本学科，则特别关注那些最令中国居民吃惊、不解甚至反感的“中医”形态。这就是为什么论坛未邀请在西方的华裔中医生，也不对老老实实拷贝内地中医的西方人感兴趣，甚至将西方“科学化”的中医排除

[4] 见“中医药管理局就中医针灸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举行发布会”，http://www.china.com.cn/zhibo/2010-11/24/content_21404195.htm。

在外——因为其与内地正在发生的情形一致，并无新意。很明显，本学科包括本论坛与国内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医西传”的定位（即借助中医主动影响西方/世界、增强民族自信心、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不投机，也容易引起华裔中医群体的不满。其实，我们对后者在中医西传进程中的作用绝未小觑，对“中医走向世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也心怀敬意。之所以甘冒被误解、被指责的风险，是因为学术旨趣令我们更关注特定的“西方中医”，除了西方社会强势、自主的特点使“西方中医”在当地的地位重要，同时这种对中国居民显得奇特的“中医”更需要通过研究、对话得到理解，否则将会引起文化间的冲突，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反向文化冲突”。

以上述“基于经络的诊断方法”为例，当代中国居民首先会觉得其“迷信”色彩浓厚，特别是“看手相定属性”，显然“不科学”；即便是有案可稽的经典章句，在内地众多质疑中医人士看来也无可信性、合理性和合法性。而中医界人士则会首先质疑其临床疗效，还会对这种牵强附会的“传统思辨”嗤之以鼻；如果不是西方人幼稚的误读，至少属于食古不化；在他们看来，中国内地的中医是当然的中医传统文化持有者，这种“西方中医”绝对是非我族类的异端，与我博大精深之中华医理不可同日而语。^[5]而在世界的另一端，“西方中医”的发明者对自己不同于中国居民的经典解读十分自豪，认为黄帝有关“万物本质的真知灼见并不是中国特有的。比如，在西方，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形成的传统学说中也都提到了这个超验性的起源。所以即使每种文明用各自的特殊形式来表现传统，传统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概念。但是不同传统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而每种形式都有自己的一致性。可以从某一传统中提取一些传统元素，将它们并入自己的传统中，收为己用，以便保持自身表现形式的一致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针灸和中医就像嫁接一种传统技术，来弥补西方的缺失。因此，由于

[5] 笔者以西方中医为题举办过22届文化沙龙，对国内中医生的此类反应司空见惯。

传统具有普遍性，我们觉得可以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以便在西方传统中重建消失了的传统医学。这项工作显然只能由西方人自己完成”。^[6]而西方五行针灸的传人已开始在中国某地开课收徒，讲授这种据说已在中国失传的针灸技法^[7]；一位居住在瑞士深山老林中的法国人，通过对其某位同胞早期中医著作的领悟，深信得中国文化之精髓，计划将其“反哺”给今天的炎黄不肖子孙并已开始实施……^[8]

如果将中国官员们担心的“去中国化”当作中医在异邦“水土不服”的“正常”文化冲突，那么以上“西方中医”在中国居民与西方居民之间引起的冲突方向正相反：前者认为这是一种愚昧的迷信，而后者觉得这种反应恰好是前者丧失了自己文化传统的表现，我们称其为“反向文化冲突”。它看来是中医传入西方后特有的，而且由于尚不为人知，所以潜在的危害更大。

这次论坛集中讨论“西方中医”，而且让中西方中医界对此展开对话，首次将这种潜在的反向冲突揭示出来，可以认为也是一个成绩。

三、人类学视角

“西方中医”确实存在，它会引起中西方之间的反向文化冲突。那么，解决方法何在？论坛邀请了有备而来的多位人类学家。其中佼佼者恐怕要数法国雷恩第二大学跨学科人类行为研究中心主任 Dartiguenave 教授，他的演讲题为“文化融合与传播”。他首先讲到使用经典比较法来研究“西方中医”时的危险：“如果将中国的中医

[6] Gilles Andres, *Le diagnostic selon les méridiens*, “基于经络的诊断方法”，中医西传国际论坛发言稿，翻译：云南大学法语系研究生杨柳。

[7] 今年5月笔者曾在南宁采访过从英国到该地授课的五行针灸传人 Nora 女士，中国学员均对其施弟子礼。

[8] 徐雅蓉：“心灵治疗大师 Pialoux 对中医原理的解读及对中国的反哺”，中医西传国际论坛发言稿。

作为参照物，把西方社会的中医发展与之做比较，这种对比就会带有进化论的意味，有可能演变为文化中心主义，或者某种形式的自我主义。”^[9]他建议将“西方中医”看作一种本地化的过程，即并非对中国中医的简单摹仿，而是西方人承袭摹本基本元素后，又根据自身特点赋予其新的形式与内涵：“在这种过程中，人们将学习到的事务融入自身的历史发展中，赋予它们有别于摹本的新的形式和内涵。这种拥有个性的摹仿事实上是违背了忠实性原则的，它赋予了事物一种新的社会存在方式。然后，由于这种个性的摹仿会舍弃摹本的一些元素，将导致摹本影响力的衰弱。由于不再关注，慢慢舍弃了摹本，人们转而开始赋予习得物新的内涵，摹本对于人们来说就只是一段遥远的，置于象牙塔中的历史和记忆了”。^[10]于是，西方人一方面将中国视为中医的发源地、将中国传统中医奉为祖师，另一方面又自由创造了“法式中医”、“德式中医”等新形式，可视为“传统中医在西方社会得到了某种解放”。本地化往往会变成一种对中医的“篡改”，搞一些与传统中医截然不同的东西出来，这其实是对中医的丰富。只有抛弃“正统”的偏见，中西双方的中医才能在相互交往中得益：“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两个社会的交往并不只会让两个社会了解彼此的特点，还会使这两个社会发现自己的独特性。正是这种对彼此和自身特性的了解，以及对通过社会交往所获得的改变推动了人类历史前进的车轮，以至于双方都能在相互交往中获得丰厚的益处。这正是我们为何要用人类学来研究两个社会的交流碰撞，以及中医理论与技法是如何被西方国家接受的原因。”^[11]巴黎工学院社会学系 Lebiauchu 先生有关西方对中医性学重读、解析与再工具化的讲稿，正是对此番高论的一个具体注解。

[9] Jean-Yves Dartiguenave, *Interculturalité et transmission*, “文化融合与传播”, 中医西传国际论坛发言稿, 翻译: 昆明医科大学张蕊子。

[10] 同[9]。

[11] 同[9]。

最后的圆桌会议，更是将“西方中医”人类学研究讨论推至高潮。通过学者间建设性的争论、交流，“西方中医”的实质越发清晰：它是西方居民根据自己特有的文化资源（回归自然思潮、后现代语境、西方“中国印象”等）对中医蓝本的再创造，“中医”语境将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从其本文化的禁忌中解放出来，甚至获得了比中医源头社会的居民更大的想象空间。正因为如此，“西方中医”的形态看起来会很夸张，并常常会引起中国居民的惊讶、不解甚至反感。只有超越临床、正统、科学等判断，以人类学实地田野调查方法，才能从西方居民的角度，去认识“西方中医”对他们的意义（革命的、宗教的、情感的、理想主义的），欣赏其所激发的西方居民的想象力、创造力，从而消除潜在的反向文化冲突。这是人类学的睿智见解。

四、“西方中医”研究引领中国人类学界走向西方

明眼人不难看出，“西方中医”研究涉及的主要是西方社会，研究者的兴趣在于阐述西方居民如何解读、重组中医，通过对这一特殊中医形态的研究，了解西方社会一部分文化资源形成以及发挥作用的过程；而研究手段主要是人类学，以期将“西方中医”放在西方社会整体环境中来理解、将它作为一个制作过程来理解、从西方当地居民的角度来理解。于是派遣中国文化背景的人类学者去西方社会做田野工作成了学科的特点，“西方中医”研究也顺理成章地给中国人类学界走向西方提供了机会。

众所周知，文化人类学以研究他者为己任，这就是为什么在人类学的发源地及发达地，不管是英国、法国、德国还是美国，人类学家传统的、主要的田野一直是自己的海外社会。今天的西方人类学，尽管其理论模式与研究对象已面目一新，但无论从现有学术格局，还是以资源分配、研究人员及学术论文比例来看，西方国家的人类学研究无疑仍旧以自己的海外社会作为主要对象。然而，自上世纪初人类学

传入中国，中国人类学界的海外研究似乎并未真正开展，尤其与发达的少数民族及农民社会研究相比，海外社会研究更显萎缩。除了在海外/国内研究力度上的倒置，中国人类学界在发展顺序上也与一般规律相反：不是从最遥远的他者——海外社会——开始，逐渐接近本国、本文化，而是从上世纪初研究本国开始，直到最近的2002年才开始试图将触角伸向海外。不管其原因如何众多，西方强势学术格局的存在，迫使中国人类学者只能按照既成话题与西方学界对话来获得一席之地。那怕已经走出国门，身在西方国家，中国学者还得顺从这个“学术主流”。这一点，北大王铭铭教授深有体会：“……中国留学生到了海外，一般来说的确是难以寻找到支持中国人研究欧洲、美国、非洲、印度人类学的经费的。世界的‘西方中心经济格局’致使学术研究出现一种将中国对象化、将西方学术化的趋势。这使我们在研究题目的选择方面受到了限制。这种状况，进一步使留学生出现某种国际学术的‘投机心态’。我们把中国的情况介绍到海外，使海外了解中国。对于将海外介绍给中国……介绍的‘海外’多为‘海外思想’，而非对于海外社会的社会科学分析。制度和格局对我们的约束，确实是限制我们视野的根本力量。”^[12]

尤其可怕的是，由于长期用进废退，中国人类学界已经对本地研究娴熟有加而对海外研究完全失语，在资源分配、学术评价及知识繁殖等体制上完全从属西方品味，虽然分得一杯羹并表面上还很繁荣（因为能同时迎合国家主义民族问题需要及西方学界对中国有关民族志知识的渴求），但由于未能建立学术主体人格，以致在研究内容上“过本土化”^[13]，在研究方法上“问题化”^[14]，在学术人格上“附庸化”，在学科建设上“侏儒化”。重归人类学本分，开展海外研究特别是西方社会研究，是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的出路。

[12] 王铭铭：《没有后门的教室——人类学随谈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13] 徐新建：《以开放的眼光看世界——人类学需要的大视野》[J]。《思想战线》，2011年第2期。

[14] 同[13]。

目前中国人类学界的海外社会研究已有所动作^[15]，但对西方社会研究反对、疑虑、胆怯者仍众，特别对西方主流社会研究更是如此。确实，比起传统人类学研究对象的“海外社会”，去西方社会做田野要困难得多，但在方法、理论、技术、伦理及学术人格建立等方面的回报巨大，非一般海外研究所能替代。^[16]因此，笔者曾将西方主流社会研究比作海外研究王冠上的钻石。^[17]

诚然，开展西方社会人类学研究，除去语言、资金等障碍，如何获得“中国视角”是开展研究并取得成功的关键，尤其是研究西方主流社会；而当代中国居民（包括或者说特别是人类学者）就像世界其他非西方社会居民一样，“西化”程度严重，无法将西方社会看作“他者”来发现其怪异之处并进行合理化解读。“西方中医”研究恰恰为中国学者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后者能很方便地察觉西方居民有关中医行为的“怪异”之处（相对于中国居民“正常”的行为）并展开研究。这正是此次论坛的功能与目标，希望以“西方中医”研究为中国人类学界进军西方建立一个桥头堡，依靠其他学科的资源开展西方社会田野工作，寻找方法、建立理论、完善技术、训练队伍、积累经验，以期成立专门的学科、学会，出版专门的刊物，让散在的研究有所依附，让有志研究西方社会的学者得以安身立命^[18]，为今后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西方社会研究作准备。

论坛圆桌会议上中西方人类学家就此展开了坦率、建设性的讨论，认为人类学是取得西方社会过程性、主位性知识的唯一方法，而这正是我们西方知识拼图欠缺的一块，正是一百多年学西方不得要领的原因，也正是当前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根源之一。中国人类学界开展海外/西方社会研究刻不容缓，而“西方中医”研究是走向西方的一条理想

[15] 北大高丙中团队已成功在海外进行过一系列田野工作；民大亦设立民族学海外研究中心。

[16] 高丙中译：《人类学名著丛书·总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17] 见笔者在民大、川大及云大所作讲座：“王冠之钻：人类学西方社会研究”。

[18] 据笔者调查，北大高丙中团队中曾进行过西方社会田野研究者，归国后无不转行，唏嘘。

途径。为此，论坛闭幕式上，由云南中医学院中医西传研究所与法国雷恩第二大学跨学科人类行为研究中心牵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人类学西方社会研究学会。

值得一提的是，在最后一天的圆桌会议上，论坛邀请的西方中医生们平静地接受了角色转换，主动参与人类学家对他们的讨论与分析，这可能是第一次人类学家与其研究对象同桌对话，至少在西方社会研究中是如此。这证明了我们原先的设想：在西方社会进行的人类学研究，其成果有可能与被研究者共享，因为后者具备跟研究者对话的能力（其它地区未必可能）。通过讨论、对话，不但消除了西方中医生们对人类学研究的疑虑，更使前者对自己的思维行动方式具备了文化自觉，减轻了原来长期存在于中医生彼此之间职业上、理念上、感情上的敌意。这样的建设性气氛，甚至出乎我们意料，是论坛最值得骄傲的成绩。

本次论坛的会标，是黑白双色的树，名“阴阳杏林”（见附图），象征中西中医界和而不同，我们很高兴与会者都努力实践了这一君子精神。希望在今后的“西方中医”人类学研究中，中国内地的中医生、在西方的华裔中医生与西方当地的中医生尊重他人对中医的解读与操作，同时，希望中国研究传统题材的人类学者能包容西方社会研究，以“西方中医”为起点，一起与西方人类学界进行主体性对话，完成中国人类学的学术人格建设。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阴阳杏林